

八十述学

赵光贤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玉田县，1910年2月24日生于江苏省奉贤县（现归上海市）。1916年返回老家，请了一位秀才教兄姐和我，读《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古文观止》、《千家诗》、《论语》等。老师的教法就是叫我死记硬背，象《滕王阁序》，《弔古战场文》，《阿房宫赋》、《赤壁赋》、《醉翁亭记》这样长篇都能背得下来，至于懂得多少，老师就不管了。这种教书方法，现在想来，觉得很不科学。或许是由于秀才先生学问有限，或许是他认为我年纪小，讲解了也不懂。这样读了三年，家里觉得各地普遍设立洋学堂，再读私塾，就落伍了，于是把我送到县立小学，读高小，那是1919年。一年级教国文的老师是一位老秀才，二、三年级的老师是一位老举人，由于我读过私塾，读新编的国文教本并不感到困难，并且开始作文言文。这时已到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的风并未吹到我们的小学，所以一直读文言文。到二年级开始读英文。在小学三年里，我最喜欢的、成绩最好的课是历史和地理，最差的是数学。这时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日本强占胶州湾和青岛，“五四运动”、俄国革命等大事，历史老师对我们都讲过，给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影响还是不小的。现在回想起来，好象我以后所走的路，一条弯而又弯的路在这时就定下了！

1925年我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四中学（在卢龙县，清代的永平府，古之孤竹国），这期间，我对学习历史的兴趣更大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了，尽管书中讲的古书我很多没有读过，但读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很快把它读完。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也出版了，我又买来读，他那篇很长的自序，讲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古史的经历和心得，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读完后，在序后写了几百字的读后感，说这篇序“是我读到的一位真正的学者的真实自述”，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顾先生是我学习的榜样。对我的影响更大的是第一次读到陈垣先生的文章。那是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期上，陈先生的《书内学院校慈恩传后》。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考证唐僧玄奘法师西遊时出发年月的错误，很使我吃惊。我认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历史学家的泰山北斗了，没有想到能有人驳倒他。关于这个论争我在《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总之，我开始认识到研究历史离不开考证，并且开始接触到搞考证的方法，对我后来研究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年暑假，我来北京考大学预科，首先考北京大学，由于我的数学水平太差没有被录取。那时北大录取学生的办法是必须每门都及格，有一门不及格，其它课再好也不能录取。当时法政大学预科也在招生，我去报名，要在法律、政治、经济三系中选一个，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我对这三系都没有兴趣，经过一番考虑之后，选定了政治系。法政大学预科录取的重点是国文，数学也考，但非常容易，我被录取了。当时的预科二年，相当于高中二、三年级，但课程则大不相同。除了读古文之外，大部分时间读英语和第二外语（德文或法文），每周18小时。此外有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都是有名的教授来教课，这在今天的高中里是见不到的。

在法政大学预科读了二年，又读一年本科。这时是1928年，当时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国民党势力很快达到北京（改名北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他上任之后，第二次招新生和插班生，我去报名考二年级，希望转到历史系。被录取后，请求转系，不许，只好仍在政治系。政治系的必修课不能不学，读英文书多，没有时间读中国史书，就于课余读西洋史。图书馆里英文书很多，我等于一面学历史，一面学英文。

1932年大学毕业，不久就病倒了。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四省都被日寇占领，怕日军进关，我家搬到北京来。1934年冬，我身体复原，恰好天津大公报到北京招考编辑，我想做新闻记者也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应考者有百余人，结果录取四人，我是其中之一。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亲自口试。当时大公报在北方很有名，社论更为大家所爱读，能在张先生手下当一名小卒也感到高兴。

从1935年春到1937年春，在大公报干了整两年的助理编辑，编国际新闻。原来想终身干新闻事业，但好景不长，日寇进逼平津，华北危在旦夕。大公报见势不妙，准备南迁，在上海设立分馆，出上海版的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派我到上海去。听先到上海去的同人说，上海馆址临大街，地方狭小，吵闹不堪，我本来就睡眠不好，此时又患肠胃病，怕去上海病情加重，没有去。我辞职回到北平后经人介绍，在师大毕业同学办的中华中学教国文。1938年新学年开始，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办的史学研究所招生，在报纸上看到招生广告，见到陈垣的名字，立即回忆起往事，认为这是大好机会，立即报名，被录取了。于是我在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回到学习历史的道路上，实现了初衷，而且在多年仰慕的名师指导下学习，在我一生中，是一次决定性的转折。

在辅仁大学的几年中从陈老师学到什么东西呢？总的说，学到研究历史的方法。如何搜集、鉴别、分等、使用史料，如何利

用这种史料作考证工作，以及做考证的必要性等等。这些优良的史学传统，至今也是行之有效的。

1940年夏，我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了，本想重点学习明清史，计划从明末清初努尔哈赤搞起，作梦也没有想到会搞起先秦史来。毕业后留校，教务长荷兰人胡鲁士要我教历史系的西洋上古史和外语系的世界史。这些课原来都是由外国人教，课本也是英文的，此时中学里都不学英文，改学日文，所以新生入学听外国人讲课非常困难，于是学校决定要我代替外国人教课。1947年夏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忽然中风瘫痪，他教的前秦史无人代替。陈老校长找到我，要我来教，说你教过西洋上古史，再教教中国古代史吧。我对先秦史没有下过工夫，怎敢上台，一再坚辞，直到快开学了，老校长又来对我说，找不到人，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来教。我看张先生的讲义第一章伏羲、神农、黄帝。我觉得这只是传说，不能算是历史，于是大胆改革，从中国猿人教起，又介绍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同学们觉得耳目一新，没有对我这现趸现卖的教师表示不满。到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的历史系整个归入师大，我仍教先秦史，一直到今天。可见人世间的事不是能由主观愿望决定的。院系调整前我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此时我知道我必须走研究先秦史这条路了，只好边学边教。首先要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四十年代后期，即我开始在辅仁教先秦史时，读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但在解放后才读到范文澜的《中国史简编》，并认识了翦伯赞先生。这样对用马克思主义来讲中国史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贯穿到教学中去。其次是认真学习中国的古典著作、甲骨文和金文。开始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他对先秦古史的研究，也用考证方法，凡

有论证总是有根有据，非常深入，我仿佛又遇到一位大师，他作的《生霸死霸考》、《殷周制度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等名篇，对我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一读再读，余味无穷。我从中学到了用考证方法来研究古史的门径。

还应当提到，顾颉刚编的《古史辨》七册，在解放前我都买来读过。此书是各家辩论古史古书的文章的总集，我主要读顾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的中心在疑古和辨伪，被人称为疑古派。他又编订《崔东壁遗书》把崔述和他的弟弟崔迈等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收齐（由亚东图书馆印行），前有胡适作的长序《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序的下部是老友赵贞信先生作的。此书近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删去一些次要的文章，但把胡适的序也删去，以顾颉刚的序代之，其实两序可以并存）。崔述的著作主要是一部《考信录》，是清人论述古史的杰作，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的来源之一，是研究古史的必读书。这部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由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搅在一起，真史和伪史很难辨别，崔氏为我们开辟一条新路。可惜后来研究古史的人不读崔书，有些崔氏已经驳倒的谬说，直到今天还在流行，真是憾事。如果说顾颉刚是疑古派的领袖，那末崔述应当说是祖师。

有人问我：“你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可是陈先生不搞先秦史，你是怎样搞先秦史的呢？”我说：陈先生虽不搞先秦史，但从他学会了如何搞考证，这个方法在研究任何历史都是必要的，这是基本功。在先秦史方面，崔述、王国维、顾颉刚都是我的老师。王国维教我怎样把考证方法应用到古史研究中去，崔述和顾颉刚教我如何分辨真史和伪史、真书和伪书，这都是研究古史的必要的本领。还应当提到郭沫若。他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著作很多，但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为最重要，《卜辞通纂》次之，都是不朽之作。《大系》是金文研究中划时代的著作，他是第一个把金文按时代顺序排列，是历史的研究法，同

时又把铜器的图像、铭文拓本、今译和考释编在一起，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著，特别是他写的考释最见功力，是后人不易追步的。我同时学习诸位大师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诸位大师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含英咀华，他们的著作都是最好的营养。我在北师大至今三十八年，除了十年动乱之外，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了。

过去的学者绝大多数是在书本上下功夫的，我认为这很不够，特别在先秦史方面，由于留下来的古书不多，不够用，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学习考古学和民族学。关于后者，由于我没有机会到兄弟民族地区去作调查研究，就不谈了。关于考古学，我特别注意，记得在1956年开过一个学期的考古学课。我教先秦史是一年级的课，每年都带学生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去参观，一次遇到亲手挖出猿人头骨的老工人刘同志，他给我们讲如何发现、掘出猿人头骨的经过，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遇到主持开掘周口店猿人洞的裴文中先生。他是我的老乡先辈，又是研究古人类的专家，他给我们讲北京猿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类学史的课。以后我不教课了，有时也带学生去参观周口店、芦沟桥。1979年以来，每年都带着研究生到安阳、郑州、洛阳、西安、周原、宝鸡、太原等地参观。我对学生说：考古工作者是站在第一线，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学家站在第二线，历史学者站在第三线，没有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研究先秦史就很难办了。因此研究古史不能没有考古学的知识。六十年代末北师大在山西临汾建立分校，我在1971年春到临汾去，在从临汾县城到分校的路上有一名高雄的村庄，中有一大洼地，附近路上都是红陶片，老乡说还出土不少各式各样的陶器、石器，带有各种花纹，他们说的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可惜全被破坏，只见到两个石犁头，比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的还大。我对学生们说，以后你们到什

么地方工作，一定要宣传保护古文物，给人们讲解如何识别古文物，这是我们学历史的人的责任。总之，学历史的必须有考古知识，否则免不了学识浅陋。学考古的也必须有历史知识，否则免不了牵强附会，贻讥通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和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我也追随大家之后，但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除了少数人老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是初学，因而在讲课、写论文中，有的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这种缺点，我在八十年代给研究生讲课时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不要重蹈复辙。我的话都写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

以上就是我边教边学先秦史的过程。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作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下面再谈谈我在学与教的过程中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一切科学之所以为科学都在于求真，虚假的东西不能算科学，但在史学中求真的难度最大。一切自然科学都可以进行实验或观察，一部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等等也可以做实地考察，史学则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无法进行实验或观察，它唯一的材料来源是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材料。尽管我们扩大史料的范围，不仅六经皆是史料，一切有文字的东西，甚至无文字的东西都可以做史料，但它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因而使用这些材料时是相当困难的。困难之一是历史文献都是人写的，写书的人的思想不能不受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种种局限，因而所写出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而

更大的局限是，古代写史的人都是史官，他不能不受统治者的控制。一般史官往往不敢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极少数如齐国的太史因为直书崔杼弑君而牺牲了性命。困难之二是古代的文字往往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后人读古书，同一句话，甚至同一个字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解，因此产生争论。困难之三是古书中大量夹杂着神话、传说，不都是历史，过去学者不知把这三者分开，因而造成许多伪史，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困难之四是古书中有许多是假托古人的伪作，只要看看《汉书·艺文志》就会发现在汉代就存在着大量伪书。此外，还有真书中夹杂着伪书，伪书里也有真书，甚至同一篇中也有真伪杂糅的现象，不懂得辨伪，就一定要上当。例如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伏羲真有其人，而且生在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成纪有伏羲庙。他创造八卦，河南淮阳县还有伏羲画卦台。他们竟不知伏羲是神话人物，庙与台都是后人建造的。不用说远古，近代史上也存在着史料的真伪问题，如李秀成上曾国藩书究竟是真是假，直到今天还未弄清楚。由于有这些困难，于是在史学界就产生疑古派与信古派之争，其实这种争论我认为不必要。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这话很对，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目的都在求其记载的真实可信。问题是有的学者不善学，往往做过头，疑其所不当疑，信其所不当信，这样就产生牵强附会，使历史更加纷如乱丝。其根源在于不会辨别史料，不会掌握考证法，当然更不懂辩证法。胡适说过：考证的原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才说十分话。”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学者喜欢标新立异，却并无充分证据，有一分证据，竟敢说十分肯定的话，这种例子简直是举不胜举。只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近来我国出现《易经》热，哲学家说其中包涵着深奥的哲理，科学家说，其中有自然科学的精义。有人说，太阳黑子导致人生病，《易经》里早就说过。

他引《易经丰卦》“日中见斗，往得疑疾”，说“日斗”是古人述太阳黑子的专用名词，“疑疾”即是疯疾或发狂。把“日中见斗”缩写为“日斗”，已经错误，又说“日斗”就是太阳黑子，不知有什么根据。他不懂“日中”是古人指太阳在中天，这是天文学上的术语，《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这是说立春之时，日出之前，朱雀七宿正在南方，“中”是“中天”。“日中”决不能理解为太阳里面，更与黑子毫不相干。如果是太阳黑子出现，人们会得疯疾，那就不是某个人的吉凶问题，而是所有地球上的人都应得疯疾，可见其说全属臆说。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常讲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我认为立场、观点固然重要，但不是太难，最难的是方法。每一门科学都有一般的方法，同时还有本学科独特的方法，史学更是如此。方法好象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有这把钥匙，你就开不了这把锁。可是当今史学界，尤其是青年们，却只重视理论，而忽视方法，这样就很难达到目的。他们热中于西方的各种史学流派和理论，我则认为那些理论都是空的，唯心的东西。由于自然科学的发达，他们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鄙夷传统的历史方法，认为那是繁琐考证，都是过时的东西。我以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能不能用来研究历史，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空论是无用的。他们把史学看成高、中、低几个层次，高层次是历史哲学，我国过去的史学都是中低层的。我以为这也是空论，搞历史主要是脚踏实地，深入钻研问题，历史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地解决，如果好高骛远，高谈阔论，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那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国史学之所以落后，有人说发生史学危机，其实是史学当作一门科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此时空谈历史理论或哲学是无用的。

如何建设中国的历史科学？我以为首先要破除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是让人们迷信全世界如此众多的民族和国家，不论

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有多么大，都要按着欧洲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认为这是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说过欧洲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仅和欧洲历史的发展差别很大，和所谓“亚细亚的”国家也很不一样，为什么不深入研究我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惜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把欧洲历史发展生拉硬套在我国历史上，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不打破这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束缚，怎能建立真正的历史科学？

我以为要建立真正的历史科学，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探讨我国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在研究时首先要消除在头脑里的现成模式。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理论指针，在它指导下，各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探索出本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写出本国的历史。我国的历史学者应当这样做，其它国家的历史学家也应这样做。

先秦史的范围很广，我起初为了教书，不能不顾及先秦史全部，但搞科研不能不缩小战线，于是我逐渐集中到周代。1980年出版《周代社会辨析》一书，主要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方面论证周代是封建社会，不是奴隶社会。此书出版后，对史学界有一定影响，但我认为还不够充实，拟再作一番修订，重新出版。从1962年起开始研究《左传》，写了《左传编撰考》、（收入《古史考辨》中），主要论证《左传》的性质、内容、编撰过程、年代和著者等问题，重点在驳斥《左传》为刘歆伪造说。这是我研究《左传》的开端，以后如有条件，打算继续作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孔子的研究，写了十几篇文章，现正在这个基础上编一小册子出版，主要是想澄清关于孔子的学说是为了奴隶制复辟的说法。近来转向研究西周年代，打算解决自武王伐纣至共和以前的年代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刊于《历史研究》、《人文杂志》上。这是为比较深入地研究西周史作基础的工作。这个工作

完成之后，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史料作一番清理工作。当然兹事体大，非一、二人在短时间所能完成。我以老朽残年，只能开个头，能否完成只能期望后来者的努力了。

1990年7月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苏辙《诗集传》孤本影印出版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诗集传》二十卷，宋苏辙撰，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由其曾孙苏诒刊刻于筠州公使库。每半版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端镌字数，下镌刊工姓名。字兼欧柳，行格疏朗，楮墨精妙，图章款识保存完好。宋代文学家苏辙作《诗集传》时，正值思想敏锐，学识成熟，见解深邃的盛年，铨经训史，独树一帜，颇具新意。今见苏辙《诗集传》通行本为十九卷本，北京图书馆藏二十卷本则是传世最早的版本，也是目下所知的海内外孤本，为世人所鲜知，在学术、版本、文物等方面均有很高的价值。

此书原装一套四本，初为毛晋汲古阁旧物，清初辗转入内府，藏于圆明园，并由内府工匠改为一套三本。后流入民间，最近由北京图书馆入藏。为保存祖国文献，满足国内外研究与收藏的需要，书目文献出版社在保持清内府原藏旧式的前提下，特以套色石印线装的形式将此书限量出版。装印精美，每部650元。欲购者可直接与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科联系。

• 殷梦霞 •